

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①

杨 中 芳

编者按：本文指出，当今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内容，渊源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作者以自己二十年来的体验和台湾近三十年向西方学习所叠积的经验得失，证明如果将西方社会心理学直接照搬或移植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只能导致重复、肤浅并与中国脱节。因此，作者恳切希望我们注意，欲要避免重走这样的冤枉路，就应抛弃懒惰和传统的“从师习性”，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对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作本土的考察和描述，并进一步创造出可以涵盖中国人行为的理论架构，设计出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研究工具，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中国，都属于近年重新恢复的学科，在开放的形势下，两者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果，开辟自己的研究道路的问题。我们认为，作者的见解和建议，不仅对社会心理学，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都有着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故将全文发展，荐介于读者。

本文原是作者为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学术讨论会所作论文，发表前又经本人重新修改并补充过。

前 言

近年来，由于大陆对国外信息及留学政策的开放，使许多人得以见闻到其他国家的先进水平，因而造成社会上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己的东西及国内自己所作的研究都是不行的，落后的。酝酿了什么都必须向外国引进及学习的心理，也掀起了一阵出国留学的热浪。这个“一窝风”的现象本身自然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题材。但这不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内容。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也不是大陆社会心理学要不要向外国学习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向外国学习些什么及如何利用所学来发展自己的研究道路的问题。

大陆社会心理学目前刚刚在萌芽的阶段，处在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许多人还不能把握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什么东西，要如何下手。很想看看别人研究些什么，是怎么做的，以使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开始。这是很值得谅解的事。然而，这个刚开始的阶段也是一个相当具有决定性的时期。因为初期的研究内容及方法，很可能把我们带领上某一个长期发展的方向及某一些的研究成果。在这段时期，正确地、明智地学习外国的经验来拟定自己的研究计划，可以引导我们取得对自己的社会有用及有意义的成果。相反的，如果我们盲目地跟从外国的研究内容及方法，它也可能带领我们走进一条死胡同，令我们走许多冤枉路。

① 本文作者感激香港大学心理系数位同事，经常作为我谈论这个题目的耐心听众，并给予我宝贵意见。在这里特别感谢高尚仁先生及杨国枢老师的鼓励及支持。但本文一切文责由我自负。

潘菽(1984)曾说:“无论在学习苏联心理学上,还是在学习欧美心理学上,我们都曾有过的不良后果的深刻经验。今后我们要坚持避免向外国学习的照搬办法。”我很同意潘老的话,也很希望大陆社会心理学在这发展之初,能不再犯“照搬”的错误。因此,我在这里提供一点我自己学习欧美心理学的经验及心得,给大家作个参考。

二十年前,我在台湾刚读完了大学,随着一股与大陆现在掀起的一样的出国热潮,到了美国,学习社会心理学。那时我对中国社会及美国社会同样的无知。可以说是“没头没脑”地“埋头”苦读了五年半,兴高采烈地捧着学位,憧憬着即将呈现眼前的康庄大道。谁知,这却正是挫折的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挣扎及体验,我才领悟到原来二十年前我正好选中了一科不能完全向外国学习的科目来做为我的终身事业。

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是由它自己的文化及历史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它的文化价值及历史条件,相当程度地左右了它的研究内容及方向,也局限了它在理论架构上的探索。它的研究成果也经常进一步肯定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

社会心理学既然是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它就不可能脱离它所研究的对象所生存的社会。这样,要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就必须在中国社会范畴中,依循它自己的文化及历史背景来选择它的研究题目及研究方向。西方社会心理学这个月亮再圆,也只能在西方国家地区照亮发光。在探研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时,是不能,也不可以全盘引进的,不然,后果堪虑。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我的讨论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我将就目前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趋势,指出它的特性及局限性。接着,我将引述台湾心理学过去二十多年来发展的过程及成果,特别看看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反面效果,借以探讨大陆社会心理学该怎么向西方社会心理学学习,要学习些什么。最后一部分,我将引述台湾近年来自己摸索的正面成就,借以提出我自己对大陆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点浅见,看法不一定成熟,希望各位同行多批评指教。这对我自己未来的研究工作的探索也会很有帮助的。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趋势

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点

如果我们将任何一本美国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目录与一本苏联的比较,就可以很快看出它们研究内容显著的不同。我最近曾把一本美国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及苏联的一本中译本作了一个非常粗浅的比较,结果列在表1中。各位手边可能都有这两本译本,你们可以依你们自己独立的判断来查看一下我的分类及判断是否正确。但我确信大致的方向是不会错的。

由表1,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将内容重点放在讨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个人心理历程**。而苏联的课本内容是比较偏重对**团体中的整体社会心理现象**的了解。与苏联的教科书比较,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花了许多章节在讨论人际交往中个人的感觉现象(如印象形成,分类),认识过程(如构系、偏见、归因),态度及态度改变(请注意:在苏联教科书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个人的吸引力(特别是仪表方面),喜爱别人的程度等题目上。如果教科书的讨论重点可以反应整个社会心理学界研究重心的话,那么显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是放在研究团体中的个人行为,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

这种过份重视研究个人心理历程,显示西方社会心理学认为造成人与人交往的主要动力

表 1

苏联与美国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内容比较

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	章数	
	苏联**	美国***
大群体中的社会心理现象, 包括: 阶级、民族、社会情绪、时尚、群众兴趣、暴动等	3	1/2
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 包括: 家庭、学校、班级、生产班组、环境等	1	1
小群体中的社会心理现象, 包括: 人际关系、人际交往、领导行为、团体决定、从众行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等	6	2 1/2
个性的社会心理学, 包括: 社会化、合群性、服从性、侵犯性、利他性等	3	3 1/2
个人在与人交往时的心理现象, 包括: 社会感知觉、归因吸引力、态度、动机等	1	5 1/2
应用	1	1
	共计15	14

* 内容分类是参阅彼得罗夫斯基(1984)的分类及美国教科课题自合并而成。

** 取自安德烈耶娃所著“社会心理学”1980年版本中译本的目录。

*** 取自弗烈德曼等著“社会心理学”1978年版本中译本的目录。

是取决于个人(对另一个或一群人的看法及好恶程度)。至于社会的及其他的外在因素都并不重要或只有间接的影响。对各种不同种类的群体或集体所可能给它们的所有成员的共同影响及心理现象, 西方学者们似乎并不重视, 只在教科书中略略提及。而且最近的趋势显示它们是越来越不被重视了。至于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与做象“社会知觉”一类研究的人相比, 那简直如凤毛麟角。

相反地, 在苏联的教科书中对团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重视是以社会组织为出发点的。除了重视团体结构的问题外, 也重视团体所带给其所属每个人的心理现象。虽然在许多的苏联文献中, 皆坦承苏联社会心理学发展得很迟(如斯米尔诺夫, 1984), 并且在许多社会心理学的题目上, 必须引述发展较早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安德烈耶娃, 1984)。但苏联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点还是非常明显地与西方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彼德罗夫斯基等(1984)在讨论集体的社会心理学时, 特别强调区分集体与群体的差异, 来说明集体社会心理学并不只是个体心理在群体中的集合。然而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对团体的研究中, 多不做集体与群体的分野, 对集体中的归属感, 集体感情等现象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这个西方与苏联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重点上的不同, 其实是反映了两者在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层次上的不同。我对苏联心理学理论所知极有限, 但举我略知的劳瑞(Lurie, 1976)为例。他的认知发展理论就是从一个“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认为人的各种不同心理活动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向更高层次去发展。而这种文化对心理功能的影响是它透过长期对在其中生活的人, 用其文化所独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而成的。这个看法当然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后者原本的理论全是从个人(生长在任何文化中都一样)的角度来看认知发展。虽然他后来曾重修他的理论, 加入文化的影响(1966), 但其根本出发点未变。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属于一种在泛人类基本个人认知发展过程中, 极其微小的不规则现象而已。

文化价值观与研究方向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 西方心理学界以社会心理学界作前锋。如山普森(Sampson, 1977)开始注意到并批评他们之过份注重个人为出发点的研究倾向。且意识到这种倾向实在是渊源于他们所处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个人主义^①的理想。在这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西方学者在做研究时对“人”本身的定义就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看法。季尔滋(Geer-

^①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狭义的定义, 如史皮柔(Spiro, 1951)所指, 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心态。而不是用瓦特门(Waterman, 1981)的定义, 他指出真正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 是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互赖性的, 因而是重视别人的权利的。

tz,1973)曾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很自然地,认为世上每一个人都是:(1)受经验限制的;(2)是**独特的**;(3)在认知及动机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协合及完整性**的个体;他也是:(4)知觉、感情、判断及行为的**动力中心**。他将:(5)这些心理成份组织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人,整个社会,及其所存在的自然环境,**相对立**的整体。

过去十年中,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这种对人的基本观点,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及重点,而且也常令研究结果进一步成为支持这个基本观点的客观证据(山普森,1981)。这个现象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表现最为明显(荷根Hogan及艾姆勒Emler,1976)。现在让我试举几个例子说明之。

1. 过份重视认知研究,强调对个人内在的动力的研究,而忽略对社会组织及情境因素的研究。

西方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研究的狂热历数十年不衰,在态度形成及态度改变的理论中,五、六十年代的均衡论(Balance Theory)及协合论(Consistency Theory),及七十、八十年代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等都属认知的研究,其基本假设可以说就是出于上述对“人”的定义中的第(3)及第(4)特性。认为人的外在行为是全由个人内部认知组织而成的一个叫“态度”的东西所主宰,而这个内部的组织是恒常的保持在均衡,协合及完整的状况。这个对人的“表(行为)里(感觉,态度等)合一”的假设不但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及理论发展,同时也暗示了合乎这种假设的人是“人之常模”,任何人不履行上述的行为法则,就是异常或“次一等”的人。于是象中国人这样在多数人人际场合,经常不表现自己的内心情感及态度与行为相当不一致的人(由于不愿得罪别人),被认为是很奇怪的。

2. 过份重视人的自主性,强调对“不合群”的研究而忽略对“合群”的积极性的研究。

西方心理学家从一开始研究这个题目起就对有“从众行为”的人抱着歧视的态度。因为他们触犯了前面所述“人”的定义的第(2)及第(4)条。他们不以个人的标准来决定行为,而要跟从别人的标准行事。不管是象艾绪(Asch,1956)式的从众试验研究或是象米格姆(Milgram,1963)式的服从权威研究,其重点都是放在显示从众行为的异常及不良后果,寻找有那些心理异常因素造成这些人有从众的恶习。然而象季尔滋(1973)及许多其他学者都指出,事实上在人类的大多数的社会中,从众才是“正常”的行为。例如,米德(Merde,1973)及巴纳(Barnard,1975)认为中国人常是因为不愿在公开场合造成不愉快的场面,所以才有从众行为。因此从众行为可以是一种适应社会的正面行为而不一定是象西方从众行为研究中所暗示那样是一种屈服于众人意见的个人心理的改变,是一种个人的弱点。

3. 过份重视对抗以肯定个人,强调由冷酷的“利己”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行为,而忽视对团体感情因素的研究。

上述对人的定义的第(5)项,即个人是与社会其他人及环境成对立的,也深深地影响到许多其他社会心理学题目的研究方向。例如在研究人际交往中,西方研究总是将重点放在自我肯定(Self Assertiveness),而不是在洽商妥协。在研究“合作”时,重点也是放在人与人“互利”的交换行为,而不在人与人之间共同拥有的感情。史宾斯(Spence,1985)曾指出西方成就动机的研究,就是本着人有(1)可以征服自然及人为环境的**必然性**,及想要征服他们的**天性**;(2)人要**精炼自己**以使自己达到最高水平,并要**超越别人**的倾向。她认为这些对人的基本假设都是源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她甚至指出美国的这种过份强调

个人成就，目前已经在美国造成许多不良的后遗症。因此，她呼吁美国的研究应该走向相反的方向，去肯定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成就。

西方文化这种肯定个人与社会其他人的对立性也在研究团体分酬行为时表现出来。在这些研究中，通常只强调研究团体中“个人的贡献”，无形中强化了人与人的差异，增加了人与人的矛盾。而没有将重点放在培养“有福共享”的团队精神上（杨中芳及徐志超，1987）。

历史发展与研究题材

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也是随着其整个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衍变出来的（沙哈健Sanakian，1982）。在三十年代发展的初期，美国心理学研究的主力是一批由欧洲逃避纳粹迫害而西来的犹太学者。他们由于自身所受到的迫害，对人类的歧视及偏见行为特别有兴趣。随着而来的是美国社会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参战后，遭遇德日军的心理宣传战，及战后政治上的排除左派异己分子活动等社会现象的发生，使当时学者对研究态度及态度改变的问题持续了相当一段长期间的兴趣；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的兴起，对传统观念的反抗，加强了对自我的研究兴趣；美苏对立的加强，越战的参与及不能自拔，兴起反战学者们“另寻出路”和平解决冲突的念头，因而对攻击行为，利他行为，及冲突解决行为有兴趣；七十年代中，越战结局的打击使美国人变得徬徨迷失（本以为越战是一场维护民主的战争，却被人指摘，而且失败得一塌糊涂）及自顾自，于是对人与人的吸引力，爱，男女角色及性关系的研究比较有兴趣。

以上说明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在每一个时期其发展的重心皆是与它整个社会的心态发展及整个社会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很密切关系的。我们要发展中国的社会心理学，也必须意识到目前中国发展社会心理学的客观条件及需要，如果强迫自己盲目发展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目前最流行的题目，那么我们将来会发现它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社会脱节而完全失去意义。我并不是否定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共同在某些流行的题目上切磋的重要性。基于国内人材的缺乏及社会需要之迫切，我认为发展当前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题目应该是当务之急。

跨文化研究与研究重心

由于过去十年西方学者如荷根（Hogan，1975）等已经体会到他们自己所作研究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许多以前对跨文化研究毫无兴趣的学者也走向了跨文化的方向。企图试探自己在西方文化上所建立的理论及行为规则，是否能在别的文化中也成立，以扫除自己理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中生存的阴影。

这类新兴的跨文化趋势与早已存在的跨文化研究有些不同。过去作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多半强调文化的差异。多数学者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不过是利用现有的工具，好奇性地探测一下两个文化的不同。在寻找到差异之时，他们多半很直截了当地将差异归于文化特点的不同，也就结束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几十年来，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基础都相当肤浅薄弱，没有太多建树，对增进了解各文化而言，自然更是微不足道。

有一些较有头脑的跨文化学者，进一步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将在自己的文化中所发展出来的研究工具，用来探测许多不同的文化。采用这些工具，先在自己文化（西方文化）中建立常模，然后认定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目前的最高点。然后当他们用同样的工具测量其他文化，而又发现其与西方文化常模有差异时，他们就认为这主要是在于这些文化在进

化上还没有到达最高的阶段。

带有这种想法的几个代表研究是拜瑞 (Berry, 1976) 及魏特金 (Witkin, 1967) 的认知分化研究,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研究及柯勃格 (Kolhbery) 的道德发展研究。后两人虽未自己承认这种“进化”的架构, 但他们的内涵假设是如此的。例如, 艾姆勒 (Rmler, 1983) 及史耐瑞 (Snarey, 1985) 都曾在批评柯勃格的理论时就指出他所谓的道德发展最高点是“个人分化式的道德”, 他所谓的成熟的道德观是“个人忽略公众所建立的标准, 而只见自己所独见的事实。将自己的行为准则放在一些人所共同制订的协议之上。”这些假设均是带有强烈的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 不但肯定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同时也建立了它的优越性。对可能由于研究工具 (由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 所带来的对另一些文化的误测误解及“以偏概全”的问题, 常被他们对验证进化论的热心所掩盖。他们对西方文化外的文化的兴趣, 当然更不是在于全面了解。

近年来, 经过许多学者批评过后的西方心理学家对跨文化研究的兴趣, 虽然并除了过去的一些偏见, 却又将注意力过份集中在探讨各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 以便建立一个超文化的, 泛人类的行为规律。这类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人的行为在某一个抽象层次上是有一个全球性的, 普遍性的规律 (Universalism)。这一类学者, 在做研究时, 仍然是用西方发展出来的工具, ① 将许多文化用几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把它们划定起来, 然后再将这些不同的文化当成一种试探泛文化理论中的“实验条件组” (Experimental Conditions)。象这一类的研究方向, 最好的例子是哈夫史代德 (Hofstede, 1983) 的研究, 他将世界53个文化用一个测验在四个坐标轴上点订起来。几个包含中国人最多的国家及地区, 如台湾、新加坡、香港在其中三个坐标上, 被分类为属于集体倾向高 (Collectivism), 权力距离大 (Power Distance) 及女性化 (Feminism) 很强的文化。彭迈克及黄光国 (1984) 在一篇总结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研究论文中, 就是根据跨文化的坐标点订来整理中国文献, 完全忽视中国文化的集体倾向性及权力距离, 可能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 而与具有相同集体倾向性及权力距离的其他文化, 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些新的跨文化学者的野心是利用以中国人作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 来探讨一些可以用以解释及支持泛人类行动的理论架构 (见彭氏及黄氏论文第78—79页)。

史威德 (Shweder) 及波恩 (Bourne, 1984) 特别指出这种大一统的思想的缺点是它经常必须将各文化中比较特殊的地方省略, 而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圈括起来。将许多看起来不相似的概念硬生用更抽象及笼统的概念把它们统合起来。于是许多在各文化中显然在本质上可能有不同的概念就被“削足适履”式地统合起来了。例如, 我们中国人在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时, 经常认为我们有如一盘散沙, 各顾各个, 非常不团结 (如梁漱溟, 1963; 林语堂, 1935)。但是在用外国工具测量中国人的集体倾向性时, 我们的得分往往很高。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不是可能由于外国人用纸笔所测量的, 只是中国人所想要在外国研究者 (或一般研究者) 面前所要表现的, 而非其真心所思。这个问题对持有大统一思想跨文化学者来说并不重要, 但对中国人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团结行为, 却是很重要的。

以上的例子说明, 当今许多跨文化的研究, 不管是用“进化论”的, 或“大一统”的指

① 最近也有见用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工具来探测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人, 如彭迈克 (Bond, 1986)。但是, 其基本理论也是泛文化的。

导思想为主，对西方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常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他们研究的重点不是在于对当地文化（如中国文化）本身行为的彻底的，反映现实的了解，而是在于片面寻找行为规律上的证据来验证他们在西方文化中所发展的理论架构。我想中国社会心理学目前最需要的应该是一些用比较客观的，全面性的，描述式的态度来归纳出自己行为规律的研究，而不是“为虎傅翼”似的去验证别人的理论。我并不是主张文化的“相对论”（Relativism），认为各个文化完全必须用它们特有的角度来了解，它们之间不能，也不可能作公平的比较。我只是主张在建立各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之前，应该先就各自文化本身的行为规律进行个别的彻底的了解，至少我们要从一个本土的角度（Natiue' s Point of View）来考虑。至于在作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是否可以把这些由各文化所归纳出来的规律，进一步抽象化到建立一个大一统理论的层次，对本地文化研究者而言则应是一个重要但不紧要的问题。我们不要让这样的野心，支使我们“削足适履”，以偏概全。

二、台湾心理学近三十年来发展的经验

台湾心理学教学及研究的工作已经有将近四十年发展的历史。在一开始是由日本学者在台湾大学建立“心理学研究室”。1949年正式成立台大心理系。1960年开始有留美学生回台任教，正式开始了其大量向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引进学习的阶段。这个引进阶段迄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在这二十几年中间，台湾的心理学发展究竟走了那一条道路？在这段过程中，有没有值得让大陆在发展社会心理学之际可以作为参考的地方？这是本节讨论的主旨。

黄光国（1985）曾回顾台湾过去四十年心理学的发展。他指出，在这些年中，台湾心理学做得最多的研究是所谓“移植式”的研究。他说：

这类研究的主要旨趣在于探讨西方心理中的问题。在本土社会中验证西方心理学理论。采行这种研究路线的人，大多熟谙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文献。他们从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中导出问题，翻译或运用西方心理学者发展出来的研究工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虽然以台湾地区的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在解释研究结果的时候却很少考虑本地特有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充分显现出“学术移植”的性格。

黄氏进一步指出这些年来移植西方研究的理论及方法的结果是：重复及肤浅。因为在作这种移植时，并没有作独立探思，也极少参考过去文献，常常是草草从事搜集第一手资料，“结果其研究理念和使用方法往往和以前的研究大同小异，花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增加的讯息却十分有限。”

但他指出最近几年，台湾心理学逐渐出现“回顾式”的及“草根式”的研究。前者收集所有有关某一项题目的研究报告，加以整理后，作一个总结及评估，以图将它们作为后进学者未来作研究的指引。“草根式”的研究则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中国特有的一些问题上，设计自己的研究工具，务必使研究成果对本土社会有意义及有贡献。

在我们进一步检讨台湾这些年心理学发展成果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看看什么因素可能迫使台湾心理学走向他们目前走的路。业启政（1984）将上述黄光国对台湾心理学所下的总评，归因于台湾及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学术研究的“边陲性”。在西方主流学术研究的阴影笼罩下，移植式的研究是所有边陲学术研究必走的途径。我个人则认为也许还有另一个中国人

独有的因素存在，那就是中国学生作学问的特点。这些特点不难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台湾的心理学会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会走向他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也不难让我们预测，如果大陆继续走目前的“引进”道路，可能也会重复和台湾一样的结果。

中国学生的学习特性

1. “从师”的特性

根据我自己在美国及香港两地教美国及中国学生的经验，我发现中国学生的依赖性较强，知识的获得常是依靠老师的输入，而非自动自发地去体会。因此他们从不怕老师给的功课多，老师给的内容越丰富，学生越觉得学到了东西，越觉得老师“有学问”。但他们就怕老师反问，或让他们凭空去想一些问题。他们少用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而是很少有机会及认为有必要用。）这可能与历来中国人作学问的方法有关。“温故而知新”是自古以来做学问的守则。考虑任何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现成的架构作底子，不然是“闭门造车”。对老师所教授的东西常先做毫无疑问的接受，再去思考，思考范围也常不超越老师自己的研究领域太远。学生很少能自主地将自己的研究推拉到较远的视野范围，去看看他的研究究竟在整个知识领域中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它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究竟有什么贡献。

中国学生的这个特性，在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训练之后，回国作研究之时，就充分地表现无遗了。他们多半继续将他们在美国跟某一位老师所学的及所作的一些研究搬回来，用中国被试再作几次，或将在美国西方心理学理论架构下发展出来的研究设计及工具，用中国被试来作验证。对这些结果究竟是否对中国人有意义，对中国社会有用，毫不关心。

由于在出国之初申请学校时，对美国各校师资水平及研究内容不甚了了，再加上奖学金等外在因素的限制，学生们去到美国念书选什么学校，作什么研究往往不能事先计划好。形成各人按运气及际遇，跟不同老师作不同的研究。如此，学成后，回到本地所继续下去的研究也是彼此互不相关，各人发展各人的。造成了台湾心理学的发展缺乏一个总的方向，形成支离破碎的混乱状态。各研究勉强可以以研究科目及研究者的个人研究范围分类（黄光国1985），却不能看出大的整体的方向。

2. “科举”式思维方法

中国学生的第二个特点也使上述混乱情况的显现有增无减。那就是中国学生不喜欢脚踏实地的从根本上来问题。也许是受考试制度之害，他们喜欢从书本上看问题，从抽象的层次上，不着边际地讨论问题。当我要求香港大学学生作一篇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报告时，他们很喜欢找一些大得不得了，抽象得很的题目，例如，“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关系”及“教养子女方式与创造能力”。虽然我一再鼓励他们“肉眼观察法”来研讨一些香港人的实际社会行为问题，（例如港人为何歧视新移民？香港黄色电影院何其多？）再试探归纳出一些值得深思的行为规律来。他们却觉得这些问题太琐碎了，太平常了，太不理论化了，所以不屑一顾。这种从根底开始的思索方法对他们来说很不习惯。他们不惯于放下书本，去看真实的世界。他们宁可回到他们所熟悉的“归因理论”、“攻击行为”及“权威服从性”里，喜欢纸上谈兵，把课本中的理论进一步发挥一番，其乐无穷。我常说我的中国学生“不喜欢将他们的手弄脏”，就像水泥匠只作比划而不实际去和泥砌砖，就来造房子一样。

这个特点使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很容易地将外国学到的抽象的概念再搬回来如法炮制一番，而很少能进一步考虑这些搬回来的东西是否真的反映中国人在中国社会所真正表现的行

为。所以他们的研究对探讨中国人的行为而言，只进入肤浅的表层。其应用价值自然更是有限了。

跨文化研究的入侵

1. 中国人的“慕名好客”习性

除了以上两个中国学生的基本特色，促使台湾留学生在回国后作惯性的，不加详思的，及“移植式”的研究之外，另外尚有一个外在的因素，那就是所谓西方心理学家的入侵台湾。这些西方学者，有些是著名的理论家，如麦克莱伦（McClelland, 1961）及柯勃格（1969）等，也有的是所谓跨文化心理学家。他们到台湾去作学问的目的及理论基础已经在上节中说过，这里不再重复。但这些外国学者的介入，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我想主要是加深我们的自卑感。

这些权威学者的名气，对向来“慕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不可能错的。加上中国人的务必使“宾至如归”的“好客”传统，常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研究及观点，去适应外来的访客的兴趣及要求。而这些访客，往往在达到了他们收集资料的目的之后，一去不回。虽然有时这些访客的研究方向很值得我们继续发展下去，它们很可能对本土研究作出贡献，但由于访客的离去，缺乏指导，这些研究可能也就胎死腹中了。所以这些跨文化访客所带给我们的灾害之一，是使台湾原来已经流于零碎的研究方向，更加肢离。

2. “名”与“利”的诱惑

这类的跨文化研究，直接支配了当地学者研究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跨文化学者的研究计划多有外国基金会的支持。以外国薪水付当地学者所提供的信息及资料是很难让人抗拒的。再加上本地学者可以在不费多大气力（只是跑跑腿而已）之下，快捷地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可谓是极好的投资。

这个现象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间接地影响了国际上各方学者对本土文化的片面了解。许多真正对本土文化研究有深刻了解的学者由于英文水平不够，无法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他们的看法自然不被重视。因此，国际上充斥了对本土文化的误解及谬论。

对本地研究更深切的后果是，这些跨文化研究加深了西方的心理学研究及理论架构的“主流性”。而像台湾这种“边陲性”（叶启政，1984）的学术研究不自觉的只变成提供主流学术理论架构的工具而已。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文的研究。由于中文是非拼音文字，对中文认知的了解及研究成为外国学者探测对一般文字认知过程了解的一个特别案例。许多中国人在中文认知的研究也只是衍续西方对文字认知的研究，兴趣在于验证西方的理论，而非真正对中国文字认知行为的了解，因而更谈不上研究的整体方向了。

当然这类研究的动机本身并没有错误。工具性研究也增加人对中国人认知自己文字的了解。边陲地区学术研究能在这方面提供资料，也属于对全学术界的贡献。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大的。

台湾心理学研究现状实例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研究题目为例，来看看上述一些反面因素，给台湾心理学研究所带来的障碍及困难。

杨国枢（1985）在总结一项“回顾式”的研究中，再次验证了上述黄光国（1985）的结论。这是一次总结有关台湾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各种正常及困扰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他评析

了近十几年来在台湾所作有关这方面的四十多项研究。他的总结是：积极性教养态度及行为，如关怀、接纳、诱导及适中限制等，有利于自我概念的发展，自我肯定的提高，内控信念及向内归因的形成，认知能力及创造能力行为的发展，学业成就的提高，道德发展及判断的促进，它并能遏止偏差行为的形成。相反地，消极性教养态度及行为，如严格、拒绝、溺爱、忽视、权威、控制、矛盾及分歧等则对子女的影响大都是不好的。这些发现与西方国家研究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

杨氏在总结过这些研究结果之后，进一步批评了这些研究：（1）研究理论基础薄弱；（2）重复过多，许多研究甚至都是用同一个研究工具；（3）绝大多数未反映中国文化、社会、及家庭特色，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新理论。他建议以后的研究应较深入地探讨教养因素与其他情境因素或子女个性因素间的交互关系，看看这些交互作用可能带给子女行为的影响。

在这一个回顾式研究中，我们得知台湾学者对教养方式与子女行为的十几年的研究努力，只不过是验证了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教育子女的基本价值观。而中国文化一些教养子女的特色都完全没有顾及到。例如，中国家庭中教养子女的代理（Agents），常不止夫妇两个，经常包括双方祖父母及其他亲人。这些多层教养代理之间的矛盾及协调对子女的行为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对子女日后与人相处的影响，当然是社会心理学最感兴趣的问题。这样一个既突出又根本的问题，中国学者却很少有人触及。

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有鉴于六、七十年代用纵容式、自发式教育下的子女，多不会拼音，手不成字，书不成文，开始彻底检讨他们的教养方式。有学者如史蒂格勒等（Stigler, Lee, Lucker, 1982）及史蒂文生（Stevenson, 1984）更见于许多东方民族的土生子女在美国，无论在学业上及艺术上，皆有超白种人的成就，而对中国及日本的比较严格督促学习的教养方式发生兴趣，正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中。这个新的研究趋势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我们又要再一次，让西方学者来牵引着我们的鼻子，开始重视起研究我们自己的教养方式？

最后，根据我最近几次走访中国大陆与同事及同学们谈话的经验，我相当担心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出国热”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当我不断地收到国内同事同学来信索取外国性格测验及其常模时，我的忧虑就更加深了一层。因为这些迹象皆让我感到，大陆的社会心理学是很可能难以逃避走上台湾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冤枉道路。

三、大陆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之我见

由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看到西方国家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及重点皆是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有渊源。我们如果太过依赖他们研究的成果及理论，将会令我们取得“隔靴搔痒，徒劳无功”的结果。台湾过去几十年借赖西方国家学校所训练出来的学者，其研究也大多还停留在原地打转，不能有更高层次的突破，这个后果很可以作为大陆发展社会心理学的借鉴。看来，大陆社会心理学如果想能在自己的国家发挥其重大的作用，它必须尝试摔掉“月亮是外国的圆”的包袱，脚踏实地，大胆地，突破过去传统学习方法所带给我们的枷锁，从基部开始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心理学。

下面，我想就三方面提出我自己的一点浅见：（1）我们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2）我们应该选择研究什么题目；（3）我们社会心理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应该做什么来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快速稳健的发展。

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认为立志从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同志应该从以下几个层次上作突破：

1. 心理层次上的突破——从自卑及依赖中跳出来。

前面说过，中国人的学习及作学问方法，向来是以“承师、模拟、记忆、创新”的次序为正统。“社会心理学”在大陆是一个新名词，它的领域应该包括些什么？要怎么研究？在这些问题上，无师可承，无理论可依，简直等于无针无线来缝衣服。我与国内许多朋友谈话的时候，发现许多人都感到惶恐，不知如何下手。外国的研究理论及方法，自然很方便地，无需苦思地成为下手的依凭。但是采用这种捷径不久，自卑心理就从这种依赖中应运而生。

事实上，中国在许多社会行为方面都一直在作非系统的研究，只不过未有象外国的学问那样加以概念化，抽象化及系统化罢了。例如，我想在中国至少有上千的文章总结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如何赢得了工农的心。这些经验的总结就可以做为中国人如何作“说服”及进行“态度改变”的初步模式。就可以作为现今想研究这方面工作的人的初步依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它们是一些在中国行得通的模式，是经过实践证实过的模式，比虚借外国的，会更有用得更多。

又如，中国在任何时候从未停止过选拔人员入党、入校、作干部、当模范。这些工作的经验加以概念化后，可以作为人选模式，来帮助探讨最近相当热门的管理人材的选拔问题。象这一类的研究可能性，比比皆是，只是需要人耐心地，细心地观察，条理地归纳，再大胆地搭出一个理论的架构来而已。

2. 在“作研究起点”上的突破——先从实际观察中国人的行为做起。

不要先从书本中(通常是西方文献中)找寻研究题材。不要先在已经架空现实的抽象层次上看问题。务必先从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作实地观察及描述后，再从这些基础题材中，去建立真正描述中国人行为的概念及规律。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很方便地采用外国书中所提到的题材及研究工具作为下手点，就好象戴上了有色的及有盲点的眼镜来看自己的社会及行为。这样，我们经常只是肯定了外国理论的真实性，却不能将结果用来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行为。因为许多客观环境因素，使我们不能将外国理论中所界限的社会行为在中国表现出来。

在这里，也许我们必须将对社会行为的了解及对社会行为的改善(Social Engineering)分开来。前者是不带批评成份的观察、描述及解释，后者则是对妨害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加以改造。这两者关系密切，却并不是一样东西，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基础。(杨中芳，1987)例如吃“大锅饭”的行为是一种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色，我们也许可以追溯它的渊源至农业社会要求农民团结以求生存的历史条件上。但在工业社会的今日，它可能是进步的一个障碍。但对“大锅饭”行为的改变必须在对“大锅饭”行为及其在中国流行的成因的充分了解并研究之后进行，才能有效。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大陆社会心理学者应该先不要对中国人自己所显现的行为型态及特点抱着批评的态度，并考虑改善的问题。应该先从建立客观事实开始。

这里我所指的做实际观察研究工作，并不是仅指用肉眼作实际观察。这种实际观察研究，除了包括实地观察，实际研究及问卷调查之外，也可以包括从中国人自己存有的各种本土材料中去探索。例如，过去有学者曾利用儿童故事(徐静，1970)、成语(赵志裕，1985)及仪式行为(李亦园，1970)等来研究中国人的亲子关系、集体倾向及国民性。其他如中国的历史及小说材料，象《资治通鉴》、《红楼梦》等，皆具有丰富的资料可以提供我们从事社会

行为的研究。所以我这里所指的“实际研究”实指一种态度，是一种不带框框、客观、公正的态度。

3. 在学习方法上的突破——从训练自己从事严谨及独立思考做起。

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我们最需要向外国学习的地方。中村元（1948）在根据中国的语言来探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时，指出中国人注重具体思维，而且“不能明确认识到实体与作用，运动，属性等的区别”（第31页），并且有将“一切都看作是个物的倾向”（第32页）。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特征很可能增加了我们成立理论架构时的困难，因为理论架构的成立必须靠将事实做抽象化的整理及作逻辑的推理。因此向外国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可以训练我们将个人主观的意见与客观事实规律分开来。

所以我建议有机会出国去学习的同学们，在外国学习的重点不要放在“西方社会心理学是什么”上，而是要放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如何研究问题”上。在总结台湾的经验中，我们提到如何摆脱服从及依赖的惯性，将研究从实证层次提升到概念及理论的层次是急切需要的。但要作这样的提升必须有很好的“研究方法”的底子。

我想大陆社会心理学最需要向外国吸收的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训练：（1）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2）问题概念化及组织概念的思维方式。我劝年青留学生不要羡慕外国的图书馆及电子计算机，而是要细心观察他们的学者如何看问题，想问题及组织思路。这样，我们是真正学到了他们的研究工具。

对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学们，我也建议大家在看外国研究著作时，将重点放在看他们的研究构想过程（通常在“导论”中提出）及他们如何就现有的，具体的实证研究结果作推论及结论上（通常在“讨论”中提出）。在我阅读中国人所著的论文时（包括我自己的在内），经常发觉我们在针对问题作研究及针对研究结果下结论两项上所表现的能力都比较弱。西方学者比较“准确”（Precise）及“逻辑”（Logical）的思维方法似乎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4. 从传统“学者不问世事”的观念中突破——从自己的社会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着手。

观看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沙哈健，1982），不难看出，许多对它最有贡献的学者的研究，都是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开始。例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创始人之一陆温（K·Lewin）就是主张作“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以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作为研究之始的。他在四十年代的主要研究，有一部份是关于如何促使美国妇女增加食用及购买奶品，桔子水，及鱼肝油等富有高营养成分的食物。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当主妇们被聚成小团体，来共同讨论后所作出的集体决定，要比用个别劝服法更可以有效地促进主妇吃食这些营养品。这个结果引起了他对团体本身所可能带给个人的影响这件事发生兴趣。最终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促成了他于194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团体动力研究中心”，展开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主要的研究题目及理论架构。

又如“态度及态度改变”研究的鼻祖贺夫兰（C·Hovland）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战事组”作情报及教育研究工作。为了要应付战时敌军对美国所作的心理宣传战术，以维持军队士兵士气，而展开了研究态度及态度改变的工作。战后，他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带领一批人在这个领域工作。并于1941年成立“传播及态度改变”研究项目，开始了一系列有系统的，有关如何说服别人的研究。这一批工作者，即成为日后研究“态度及态度改变”的

先锋。不少理论的架构皆是从那些早期解决实际问题中得出的。

不可否认，西方社会心理学目前走向了理论的牛角尖，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使他们有充足的人力财力来支持非应用性的研究。在外国学术杂志上，经常有学者为了极小的，极繁琐的小事，作理论的争辩。然而大陆目前在才、财两缺的情况下，如果也跟随潮流去钻研一些比芝麻还要小的理论争点，可以说就是一种奢侈及浪费。更何况西方许多有远见的学者如米勒（Miller, 1969）及史宾斯（1985）已经在呼吁西方心理学研究者应该煞车调头，走回去研究与社会有关的问题。

台湾在最近几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在向这方面努力（见杨国枢、业启政，1984），成果斐然。说实在的，中国目前有太多急迫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许多都是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可以帮得上忙的。例如中国目前住屋的严重短缺，使一家人经常必须在很窄小的空间中生活。研究如何利用少有的空间，使居住者减少拥挤压迫感，应该是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题目。社会心理学中的“环境心理”的研究就包括这一类型的研究。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钻研肯定会比一个根本不知“拥挤”的意义是什么的西方学者所作的研究要更切实，更有意义些。

其他，例如中国家庭中婆媳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种问题，自然谈不上这种研究），青少年新价值观念的建立等，都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开始。甚至一些看起来非常琐碎的问题，例如，为何北京公车汽车乘客不排队？都可能在仔细探讨后，进而加以概念化，将问题提升至理论的层次上。这类的研究对了解中国人的一般社会行为肯定是会有贡献的。

5. 从“急求心切”的困境中突破——坚持在一个重点研究题目上作深入的探研。

前节说过，引入外国人的研究概念及工具常导致“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型态。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持有外国工具的学者的去来，经常使本地学者对各式题目仅保持短暂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因为外国研究工具的多样化，使中国研究者眼花缭乱而致只能“浅尝而止”，不能集中精神在某一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虽然我在这里呼吁各位要小心学习及引进外国概念及工具来研究中国人的问题，但我知道大家难免还是要走上这条道路的。那么要紧的是不可以只停留在验证外国的概念及理论的阶段，而要持久地继续研究下去，看看中国人的行为是否可以用外国的概念所包含？它与外国概念有什么不同？进而发展涵盖自己行为的理论架构。

近年来，台湾在“成就动机”方面的研究就是这种在利用外国工具作深入钻研之后，而能在理论上摆脱西方的窠臼的最佳实例。过去许多学者，包括麦克莱伦自己，都曾到过台湾，用他发展出来的“成就动机”概念及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人的成就动机。结果总发现中国人的“成就动机”较低（余安邦及杨国枢，1985）。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些结果倍感困惑，因为这与中国人的“寒窗夜读”及“出人头地”的传统价值观不相吻合。于是有学者如余氏（Yu, 1972; 1980）开始对麦克莱伦的理论加以深入地彻底地批评与检讨。认为他的理论不适合解释不注重个人主义及独立训练的文化。杨国枢（1978）更进一步提出中国人的“成就动机”可能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简单。他建议将中国人的“成就动机”分为三部分：“学业成就”，与西方概念相近似的“自我取向”性的；及一种比较与中国文化相呼应的，较具“社会取向”的，“非由自我决定优越标准”的动机。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努力钻研，我们肯定可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成就动机的全貌。将来，甚至可能在泛文化的动机理论层次上作出贡献，因为它代表一种超越西方文化外的一种具“社会性”的成就动机。所以在在一个研究题目

上，长期耐心地工作，以求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的正途。

应该选择什么研究题目？

在这方面，我的建议是我们分三个方向进行：（1）选择目前中外学者们在对中国人的研究中，发现有显著矛盾或不一致结果的题目。对它们作**更彻底的、从头开始的、本土性的**探研。（2）选择一些中国人所**独特具有的**，及对中国社会行为有**非常普遍影响**的概念来作为研究题目。（3）探讨**最能适合研究中国人**的研究方法。

1. 彻底地从头研究几个目前最重要的，但也最具有争论性的研究题目。

这里所指争论性的来源，可能是出于在“移植”外国概念及工具作研究时，所出现的相互矛盾的或不容易解释的结果，也可能是出于在观察外国跨文化著作时，对那些作者们加诸中国人的行为的假设及结论不能完全信服，因为这些假设及结论与中国人对自己行为的观察及了解不相一致。前面的矛盾可能显示外国发展出来的概念及工具并不能涵盖中国人相对的行为，后面的矛盾可能显示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概念及行为有所误解。这两种矛盾同样提醒我们必须摆脱外国概念及工具的枷锁，并构想新的概念架构来帮助彻底了解中国人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更进一步地走向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了。现在让我试举几个研究领域为例说明之。

A. 成就动机 前节提到，许多学者在采用西方发展的“成就动机”概念及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人时，经常得到低于美国及许多西欧国家样本的结果。因此有人就利用这个结果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因为麦克莱伦（1961）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就动机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成就水平又与这个国家教育子女的方式有关，愈是训练儿童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国家，成就动机水平愈高，许多人因此就将中国人在成就动机上得分低的结果与中国文化中教育子女的依赖性连在一起。

这样的理论架构似乎很难解释中国人“寒窗夜读”“孟母三迁”奋发精神。所以这让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几个疑问：中国人的成就动机是否真是低？西方的测量工具是否真的能涵盖中国人所定义的成就动机？独立训练是否一定与成就动机有密切关系？成就动机是否与经济发展一定有密切关系？

目前在管理学的领域内，中外学者均将成就，象解释马斯洛（Maslow, 1970）的动机层次论中的最高“自我实现”层次一样地解释为是完全“个人的”，“自利的”，对成就所可能具有的社会意义却弃之不谈，这是深受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的影响。在一个注重社会场合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成就动机这个概念是否和西方社会所界定的是一样东西？西方个人性的成就是否也是中国人对自己要求达到的最高点？中国人“兼善天下”的理想是否有影响我们对成就的定义？

近年来，亚洲地区，中国人居多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也让人觉得对过去连系成就动机及经济发展的理论有作重新探研及评估的必要。加上西方个人主义的成就动机概念已经带领他们走向不良的极端，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未雨绸缪”地将研究重心放在探讨如何培养比较具有“社会性”的成就感，而放弃追随西方去进一步探讨“个人性”的成就感。更何况，正如山普森（1985）指出，目前西方心理学界也已经显现有走向这个研究方向的趋势。

我觉得中国文化的注重和协性，正是作这类研究的温床。如此，我们可以在这个研究领

域中，走在西方的前端。

B. 道德观及其发展的研究 中外许多学者也都曾用柯勃格 (1969)的道德认知发展的概念及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人的道德发展，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发现中国人多不能象美国及西欧样本那样，在成年后进入柯勃格的最高的“自制”阶段，有学者，如许烺光 (Hsu, 1983)曾指出，许多亚州社会性较强的国家，并不视柯勃格的“自制”阶段为最高理想，因此也没有必要发展到那个阶段。

也有学者，如威尔森 (Wilson, 1974)，则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中国成年人的停留在“他制”阶段。他作研究发现中国孩子道德观的发展，事实上比美国孩子早就进入柯勃格“自制”阶段。但是后来由于社会性价值观的压力，使成年人又走向比较个别化 (Particularistic)，感情化，及社会倾向化的“他制”阶段。

最近台湾学者如雷霆及程小危 (1984)曾将西方学者试图融洽文化因素于柯勃格理论架构的模式，拿来探研中国文化与道德发展的关系。他人的研究证实了柯勃格道德认知发展阶段次序的泛文化性，但也证明中国人道德认知的内容是比较属于受文化影响的一种。

威尔森及雷霆等的研究都是试图在柯勃格理论架构的基础上，来探讨解决它在被应用来解释中国人行为时，所产生的一些具有争论性的问题。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更深入的研究却应不只是循随柯勃格的理论打转，因为这样做大有削足适履之嫌。前节曾提过西方学者如史耐瑞 (1985)等都曾批评柯勃格理论的个人主义局限性。丁氏 (Dien, 1982)曾就这一点提出正确探讨中国人的道德行为的途径。

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以道德为行为规范的。也许中国学者应该试图先看看中国人的道德观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举例来说，过去学者判定中国人的道德推断是“他制性”的。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任何在中国文化下生长或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学者都知道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人是肯定的，对个人的努力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极端重视的。道德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私德 (梁启超, 1936)，是以“自制，自律”为准绳的。然而中国文化下的自制与自律，在定义上与西方的不同。它并不是指一切按照自己衡定的是非标准，来发展自己的行为规范。它是指内求的，克己的不自私的，遵守维持一个良好社会秩序所必须加诸于自己的约束，来作为行为准则。亦即是受“礼”的约束，这些道德观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不求加诸于别人身上的。

东、西方对道德概念基本看法的不同，很可能是造成过去研究结果互相不协调的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深思。最近杨中芳 (1987B)试图从中国人对“自己”这个概念的界定与西方人的差异来辩证为何我们必须用较社会性，非个人性的定义来看中国人的道德发展。在这方面的持续钻研，也许可以打破柯勃格理论垄断的局面，进而摆脱个人主义渊源理论的枷锁。这方面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相当直接地主宰中国人对法制的看法。

C. “集体主义”的研究 许多外国学者发现中国人在集体场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就肯定中国文化是没有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很强的文化。经常他们将这个假设当成是不幸的事实。而他们的研究通常也都建筑在“中国人是具有集体倾向性的”这个基础上。例如，梁觉 (Leune)及彭迈克 (1984)就是基于这个假设来探讨中、美学生的分酬行为。认为中国人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倾向于平均分酬。其实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具有集体主义倾向性吗？我看过去的研究只证明，表面上，中国人没有“个人倾向性”，但是集体主义倾向性中所应该包含的团队精神，我们却也付之阙如。除了早期学者

如梁启超（1936）及梁漱溟（1963）等指出中国人的缺乏团结性，近期中国学者如金耀基（1981）及一些熟知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如中村元（1948）及狄百瑞（1983）等，都正面的指出中国文化是肯定个人的。这些研究令人无所适从，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是具有还是不具有集体倾向性。

到底中国人的集体倾向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表现？这些都是相当有趣的问题，急待进一步研究。杨国枢（1986）曾指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能只是一种家族主义倾向。其他如何友晖（1979），及许志超（1984）等也都在界定中国集体主义这个概念及发展测量工具上作了努力。

不过，我们还必须回到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个人自己的问题上。而个人自由问题又与一个人如何界定他自己和他人的界限有关，叶英莖（1972）曾提中国人生长在中国文化中很少能体会到西方文化所界定的自由。杨中芳（1987）则认为中国人对自己及他人的界限并不是分得很开。所以有时“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甚至有时“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而浑然不觉有什么不妥。以致有时将个人自由伸展到妨害别人的自由之上。这些文化的特色肯定对他们的集体主义倾向性及集体行为有很重大的影响。这方面急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D. “权威服从”的研究 另一个被西方学者认定是中国人的特征的是“权力距离”及相对应的服从性，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应用象哈夫史代德（1983）所编的测量工具而作的研究都证实中国人是倾向于服从上级的决定，认为自己的命运操纵在有权的人手中，也比较能接受有权者与自己是不同的，可以享有一定特权的。其他学者如黄氏（Hwang）及哈瑞斯（Harris, 1973）则用实验法证明中国人较具有权威服从性，因此也比较喜欢权威式的领导方式。

然而，也有学者如希尼克（Hiniker, 1969）怀疑许多有关服从性的研究的可靠性。因为正如杨国枢（1981）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倾向性高，所以他们在回答问卷的时候总喜欢给予社会赞许的答案（杨中芳及赵志裕，1986）。在问卷上表示服从上级在中国社会中肯定会被赞许的，加上中国人由于受到“礼”的约束，对“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作什么事”规定比较严格。因此，在探测“权力距离”时，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是无条件的服从有权威的上级。其实所测量的可能只是中国人对“礼”的执行及表现。“服从”很可能只是表面行为而已。我们经常听到许多的中国经理抱怨那些“表面听令”其实“背后反抗”，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下属。我们也经常看到中国上下属在人际关系方面远比西方主佣关系要平等及亲密得多。那么，究竟我们有没有“权力距离”？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有？在什么情况下没有？目前还没有见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研究。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看看中国领导与下属之间所存在的一个“服”字的概念。

西方学者在谈到“权力距离”时，往往只看中国下属给与“有权者”的权力及优惠，对“有权者”所作的期望及所存有的依赖感，但却不见两者之间存在的“服”的关系。所以外国工具测量所得的“权力距离”都不包含上属的值得信赖性，值得依靠性等是基本上在西方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不被重视的感情因素。因此用西方测量工具测量“权力距离”时，可能只测到了中国人对领导或上级关系的一半，而未知其全貌，

在台湾作的一些有关领导的研究（如郑伯璜及庄仲仁，1981）发现中国人在看领导时，除了业绩，及与下属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领导本身的一些素养，如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等。

这一点显然说明研究中国人对领导的要求并不能象西方这方面的研究那样，专谈业绩 (Performance) 及人际关系维系 (Maintenance) 即可，还需要注意社会对这两个角色(领导及下属) 所订下的行为规范才行。

“权力距离” 可谓是领导与下属所签下的一个互惠合约。这个互惠合约是必须要双方都遵守他们的角色所规定的行为才能生效的。领导本身必须做得“正”来争取下属的信赖及依赖，才能享有下属的尊敬及角色所付与的权利。这些在中国人所界定的上下属关系中，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概念，在外国有关领导的研究中却很少出现。所以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的。

2. 研究一些比较属于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社会行为及现象

在整个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家均受到同样的工业化、都市化，及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而趋向泛文化的方向。中国的社会，不管在结构及价值观方向，也都在不停的改变之中。但无可否认地，中国社会还是相当具有农业社会的特征：注重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团结及和谐(钱穆，1980)。因而对世界上的外力**讲适应，不讲征服。对人讲礼，重次序，重服从。**家庭是维持团结的主力。在其他人际关系方面，则有“社会倾向性”，重面子，讲人情，重关系。对人的要求，讲义务，重自爱，自制，自律。

对这些主宰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主要概念，我们究竟有多少了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来说只能是否定的。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前多是来自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直到最近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才有比较多的心理学者注意到这个研究方向的重要性，认为这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最终途径。因而进一步对这些题目作概念化的整理(见：黄光国，1985；高尚仁，1985)。实证工作可以说都尚未正式开展。下面我就很简略地提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

A. 重新界限中国人的“人”的概念 史威德和波恩(1984)曾提出，在世界上，许多文化对“人”的构想是与前述西方的构想不一样的。这些文化下生活的人认为：“人”是具体的，非抽象性的，不常作一般化思考的，受外界偶发事件限制的，很重视事情的内容的，不对事物作过多的分化的探索的，而且是非常受情境因素所影响的。我想这两位学者所提出的这个“人”的构想比较接近中国人对“人”的看法。许多其他学者也指出中国人是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许烺光(1971)曾建议我们放弃用个人主义的眼光来看“人”，西方国家的“人”把每个人当成是一个独立，无须依靠别人的个体。中国人对“人”的界定应该用“仁”来看。“仁”主要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时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真正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性的建议。很可惜自从他提出这个概念至今已有15年了，却没有人更进一步的将这些想法加诸研究之中。

在这方面，除了许氏的“仁”之外，早年费孝通(1947)的“差序格局”概念及杨国枢(1981)的“社会倾向”性等均相当具有说服力地描述了中国人的行为倾向。但这些概念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被用在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架构中，将它们用在探测中国人的个人差异方面的研究却不算多。然而，它们对深入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性却是不可忽视的。将来我们或许应该采用它们作中间变数(Intervening Variables)，从其中更深刻地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研究面子、人情，及关系时，有的人的“社会交往单位”是“家庭”，有的人是“个人”。是否中国人个别的“社会倾向”性影响到他会采用“家庭”或“个人”作为交往的单位呢？又如在研究中国人助人的行为时，对中国人的界定“自家人”及“陌

路人”的研究就是必要的。是否“差序格局”性愈强的人，对“自家人”及“陌路人”的分野愈显著？另外，一些中国人经常用以形容与人相处的“性格”形容词，如“有人缘”，“知分寸”，“懂人情”，“合群”等可能都和一个人的“社会取向”有关联。由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尚需花许多的时间及精力来研究这个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最基本的概念。

B. 面子、人情、关系的交互作用 早期中国人类学家如胡光晋（1944），及许烺光（1971）等均讨论过“面子”在中国社会行为中所伴演的角色。但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再进一步对它们作有系统的探讨，例如，何友晖（1974；1976；1978），金耀基及麦雅斯（1977），彭迈克及李氏（1981）、文崇一（1982）等。同时，也有学者开始讨论“人情”（金耀基，1981）及“关系”这两个概念（乔健，1982）。黄光国（1984）更进一步试图将这几个概念统合成一个中国人与别人交往的基本模式。这几个概念的交互关系可谓是中国人特有的一些社会行为形态。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还是在十分幼稚的阶段，但却是目前最有成果的。在这个题目上，目前最需要的是采用这些概念来作实证研究并用它们来预测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行为。中国人的送礼行为（杨中芳，1984）及计策行为（齐健，1984）可以说是很好的用来研究“面子”、“人情”、“关系”的实际社会行为。其他如请客、送彩礼、冲突解决、“中间人”的行为等均可谓是研究上述课题的好素材。

C. 中国人的“与外界妥协”的行为 前面曾提到中国人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往往不是对立的，而是妥协的。“缘”及“报”的概念似乎是中国文化发明出来帮助我们如何减少人与外界之间冲突的设计。“缘”是一种将原因推托到外在不能解释的原因上的一种想法。

（杨联陞，1954）指出，也是一种将与别人的私恩、私仇留给上天来替人结算的、“向外求助”的心理。这些设计，对中国人维持社会和协性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杨国枢，1982），它们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李沛良，1982；文崇一，1982；许烺光，1971）。特别是对中国对困难、灾难及冲突的应对行为（黄光国，1977），对婚姻关系（杨国枢，1982），及消费者“权益的认识及要求赔偿”行为（赵志裕及曾细忠，1984）等均可能有相当显著的影响。

另一个与中国人的“缘”及“报”有关的，值得探讨的题目是它们与西方学者经常谈的“外控”在概念上有什么不同？由于西方“个人对抗外界”的价值体系的影响，外国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内控”之上，而对“外控”的进一步探索一直不太感兴趣。一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如威滋等（Weisz, Bothbaum, Blackburn, 1984）提出所谓“次要的控制”（Secondary Control），亦即不是对抗性的控制，而是一种妥协性的控制。妥协性的控制是一种认清世界上事情有时是越对抗越失去控制，而相反地，如果能顺适情况，反而得以控制自如。这个概念的发展，固然代表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文化以外的控制方式。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小嶋（Kojima, 1984）及东氏（Azuma, 1984）所指出，西方学者之命名这种控制为“次要的控制”，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对抗性的控制是首要的，是社会的价值观所在。但是在以维持和协性为主的东方文化里，妥协性的控制应该是常模，也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的一种控制。所以在中国致力于研究本土的“缘”及“报”等的概念是必要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如谢氏等（Hsieh, Shybut, Lotsof, 1969）及劳氏（Lao, 1977），在运用西方发展出来的，研究内外控的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人时，皆发

现中国人的外控性是很高的。但是，在仔细分析他们在量表上各项问题的资料，发现他们主要是认为自己的命运并不一定操纵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种感觉却并没有影响他们做事“尽力而为”。对中国人来说，“尽量努力尝试掌握自己的命运”，亦即西方定义的内控，似乎与“认为世事并非人为因素所能完全决定”或“自己的命运非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等外控的想法，可以齐头并存。这样一来西方学者对内外控所作的界定及理论，用来研究中国人的内外控可能就嫌太简单化了。

D. 对家庭及“孝”的研究 中国的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以家庭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杨懋春, 1972)。人类学家许烺光(1971)曾指出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是以父子为轴的, 而非以夫妇为轴。而巩固这个父子轴的基本价值就是“孝”。杨中芳及高尚仁(1987)最近曾收集大陆、台湾及香港的资料来讨论家族主义(Familism)在现代中国人的社会里的地位。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 固然这些社会在过去几十年历经不同的政治及社会因素的冲击, 也都发展成为较现代化的社会, 但是传统文化家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仍然存在。因此可见家庭对中国人行为影响之深。然而遍观中国心理学者对家庭这个题目所作的研究, 除了跟随西方所作的一些有关教育子女的研究外, 其他的, 真是了了可数, 乏善可陈。

例如, 对“孝”的研究一直都停留在问卷调查“孝”道重不重要的阶段, 直到最近, 杨国枢(1986)才将这个概念进一步加以概念化并制订测量工具。他利用西方学者对“态度”的概念化架构将“孝道”分为“孝知”, “孝感”, “孝意”, 及“孝行”等四部分, 可谓是为这方面的研究创下了新的局面。至于它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则尚待实证研究的考验。

杨中芳及高尚仁(1987)曾指出, 中国人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及终身性的。中国儿女之对父母行孝道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关怀及照顾的无微不至。所以如果研究中国人的家庭集体主义, 只谈孝道, 而不谈父母对子女所付出的感情及义务, 那就太片面了。

最后, 我认为有关家庭的研究, 至少还有两个领域是值得探索的。其中之一是一个人对父母的孝心, 孝行, 也许可以反映他对别人的交往关系。也许对“孝”的测量, 还可以进一步用以反映一个人对“兄弟之情”, 对“朋友之忠”, 对“陌生人之义”。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对“孝”的社会化的研究。“孝”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 它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要如何培养是可以作研究探研一下的。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从根本上解决如供养父母, 婆媳关系等社会问题。

E. 对“孝”以外的人际感情的研究 其他几个左右中国人与人相交往的感情概念如: “忠”, “恕”, “信”, “义”等都在中国文化的不同层次上及发展过程中, 担起很关键的作用。但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支离破碎, 及由历史学家及文学家来担当主要研究工作的阶段。显而易见的, 这些都是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很重要, 很丰富的素材。过去数年间, 欧美心理学家, 如麦克比(Maccaby, 1982)及札杨克(Zajonc, 1983)有鉴于过去二十年来, 过份的强调认知的研究, 已逐渐走向研究感情因素的方向。同样地, 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的文化。看似矛盾地, 它既重视压抑感情, 又经常以感情为交往准则, 因此可谓研究情感的温床。如果我们能对感情的研究多下一点功夫, 我深信我们会对增进整个世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有所贡献。

F. 现代化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中国目前面临快速的现代化发展, 而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似乎比工商业的现代化慢了半拍, 许多传统所保有的价值观及社会行为型态常是有碍于

现代化的进展。例如，中国人的讲面子，托人情，拉关系及送礼的行为，常使中国不能快速地提高办事效率及保持公正性。因此，要有效地推展现代化，我们必须详细研究如何进行心理的现代化。

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有远见的社会观察家及改革家来呼吁推动之外，主要还是要靠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现代化需要具有哪些心理特性（态度及价值观）及如何利用基础社会心理原理来改变人们原有的落后心态（杨中芳，1987）。

近年来，在台湾有学者（如杨国枢及瞿海源，1974；杨国枢，1986）先后编定了数个测量中国人的传统性及现代性的量表，来探测在个人层次上中国人现代化的程度及方向。杨国枢（1985）曾总结在台湾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内修取向与集体取向（强调上下关系）变向实行取向（强调外在成就）与个人取向（强调个人主义性）”。他并指出这些现代化的结果，在整个社会的层次上，也取得相对应的结果。

台湾的现代化过程和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免走向西化的终端。他们的研究结果好像暗示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道路，但是，这究竟是不是现代化唯一的道路呢？是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最终一定要放弃中国人固有的价值观及行为形态？是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也一定要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所有弊病？我们如何取长补短？我们能否研究出另一个途径，让我们可以在保有中国人固有的社会性的条件下，还能够进行快速的现代化？积极作研究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刻不容缓的。

最后，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心理的适应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题目。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开放政策，使中国大陆这个原本完全封闭的社会，在瞬时间接受了許多外来的，片面的，千变万化的讯息。这种迅速的转变对中国人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让人们在接受了外国的先进的技术水平之同时，能够不盲从，不认为“外国的全是好的”？如何让他们在“机器取代人”的进步中，尚能肯定人的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研究题目。

3. 寻求适合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方法

中国人的一些社会心理的特性，常使我们在研究社会心理时，倍感困难（杨中芳及赵志裕，1986）。这里我不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那会牵涉到相当复杂，抽象的哲理问题。现在我只想从实用的角度来讨论目前所有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研究中国人。

杨中芳及赵志裕（1986）曾指出，由于中国人的“社会倾向”性高，我们很担心自己在别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也很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表露自己真正的看法及行为。在一个研究环境中（不管是实验室或自然观察的情况），中国被试很容易地将研究者（或主试人）看成一个“陌生人”，并将研究环境当成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最保险及安全的行为准则是遵守“社会赞许”的法则。例如，尽量说些客套话，及不伤害和得罪别人的话，不会做出积极或偏激的反应。同时，他们也会考虑在回答问题时以不损害自己面子，又不伤害主试人面子为反应基准。

杨国枢（1982）曾在总结自己作研究的经验时指出，中国人在作反应时常具有以下几种心向：（1）社会赞许心向，依据社会本身的期望来作答。（2）默认心向，对任何问题皆答是，不管自己真心反应如何。（3）中庸心向，不给过于偏极的反应。（4）避免反应心向：逃避任何问题，尽量避之而不答。根据我本人的经验，他们还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及在作

群体反应时，给予与群体其他人一致的反应，以避免“突出”的倾向。

瞿海源（1982）曾讨论过台湾在作行为科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他指出用得最多的是问卷调查法，西方社会心理学比较常用的实验法在台湾的研究中则比较少用。这些问卷调查法看似对研究中国人的行为相当适合。因为它不需要被试在公众场合下或在主试面前作反应，只要求各个人独自在私底下作反应，有时甚至无须具名。但也正因为这种工具的隐避性，对不太愿意向外人（主试者）揭露自己的中国人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不经心地随便作答（因为反正也查不出来）。因此，最近的研究发现他们常是给予“社会赞许性”的答案，而非自己真正所想的（杨中芳及赵志裕，1987）。最近杨国枢及彭迈克（1980）曾作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在外国主试面前对同一个刺激的反应与在中国主试面前的反应就不一致。这都说明我们的过分依赖问卷法，事实上是不可靠的。

过去学者，如阿报特（Abbott, 1970）发现，中国人在看事情时，有“以全概偏”的趋向（Global Perception）。而西方研究工具往往是隔离某一个特殊概念或一个独立的变数单独来研究。如果我们过份依赖西方测量工具，则我们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对事情的全面看法及全面反应。所测量的只是中国人在极少情况下，对局部刺激所作的局部反应而已。

又如，中国人是比较注意实际的民族（中村元，1948），如果要求被试在一个真空状态下，假扮另一个角色，或假想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处在一个假想的情境中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可以由中国电影明星之不愿扮演坏人，可以看出中国人很不容易，（也许根本不可能）完全由个人现实角色提升至另一个假想的角色中去。由于这个原因，使西方社会心理学家所常用的扮演角色法（Role Playing）及假想情况法（Scenerio），可能在中国实行时，都变成“可行性”很低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发展外国研究中没有用过的方法及设计（Paradigm）。前面说过，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曾被指出是与西方人不同的。极端抽象的思维对中国人是困难的，中国人喜好用类比法，用两个实际事物说明另两个实际事物间的抽象关系。我相信，唯有将这些中国人所熟悉的思维方法考虑在内，我们才能设计出真正适合中国人的研究工具。这方面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当务之急。

社会心理学会可以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做些什么？

我认为大陆的社会心理学会除了定期开年会，以促进学员们彼此的沟通之外，可以在另外三方面给与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帮助：

1. 成立文献及资料库，提供研究帮助

在大陆，目前最缺乏的是信息的流通。因为大陆现时图书馆内藏书有限，许多分散各地的学者无法看到外国及其他地区同事所做的研究。这种信息不流通的现象，容易使各地研究者闭门造车，重复别人的研究而不知，并无法有进一步的探讨，浪费已经短缺的人力物力。

在香港大学，我系已经在筹备成立一个大陆地区以外的，有关中国人的研究的资料中心，现已有大量摘要被储放入电脑中。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实有待人也将在大陆地区的，有关用中国人作被试的，所有社会心理学研究论文加以收集及整理，放入电脑中，以供各地学者前来查讯。将来这两个资料中心可以相互交流，使我们能掌握有关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的全部资料。这样对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工作者而言，将是一个福音。

同样的，在资料收集方面，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也无须一定要亲自去收集第一手资料。台

湾的经验也说明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收集第一手资料上(瞿海源, 1982), 但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咀嚼及分析所得到的资料。现时在大陆, 由于电脑设备及其知识的缺乏, 使许多非常让海外学者羡慕的第一手资料, 无法用快速的比较先进的统计方法来处理。

如果社会心理学会能在某处成立一个资料中心, 并在内部设有电脑中心, 提供统计分析服务。这个中心除了暂时可以提供给收集得第一手资料的人作比较快速、先进的统计分析之外, 还可以让对某一方面研究有兴趣, 但不便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人, 利用别人的资料(在征得对方同意之下), 来作不同的分析。这样, 既省事, 也可以将已收集的资料加以充分的利用。

另一个好处是, 资料中心也允许别的研究者来查证一下另一个研究者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有时, 并不一定出于作者有心欺骗, 可能由于意外的疏忽, 资料的计算出了错误, 以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这时如果有别人发现可疑之处, 重新分析, 当排除了计算错误这个可能性之后, 再去寻找别的原因来解释疑难, 这样可以避免走许多冤枉路。当然, 容许他人来查证, 也是确保研究水平的最好方法之一。这在西方社会心理学较发达的地区, 是一个普遍的惯例。只是这项工作并不由心理学会来担任, 而是由学术杂志出版者来担任。我想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有专属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刊物, 社会心理学会也许应该暂时负起这个维持会员们研究水平的责任。

2. 寻求研究奖学金, 用以支持某些重要研究方向。

前节提过, 要发展中国的社会心理学, 有一些基础研究题目是必须先了解清楚的。我们应该用各种方法鼓励会员多朝那些方向努力, 使他们在基础问题上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作出贡献。当然,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为他们争取到研究奖学金, 那是最经济实惠的鼓励。国家研究经费, 商业机构, 私人基金会等, 均可是我们的财源之一。

3. 创办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专业学术刊物。

任何一个学术团体, 如果没有一个同业者可以共同使用的正式信息交流工具, 就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组织。它也不可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所以乘早创办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专业刊物, 将会促进社会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结 论

本文在走马看花的状况下, 试图为大陆社会心理学发展勾划出一个蓝图。我的看法是:

(1) 西方社会心理学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方法及态度, 而非实质; (2) 跨文化研究值得我们参考的是从结果中所产生出的问题, 而非结果本身; (3) 中国人自己的行为特色,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 用适合自己的研究工具来慢慢细心钻研; (4) 从我们自己目前的社会问题着手, 彻底地, 从头开始地作起; (5) 走捷径地采用外国研究工具及方法, 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零散及研究方向迷失。因此, 致力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 才是健康的道路。

参考资料

安德烈耶娃: 《社会心理学》,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0年。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年。

乔健: 《建立中国人计策行为岛议》,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第309—326页。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1984年。
- 郑伯璜、庄仲仁：《基层军事干部有效领导行为的因素分析：领导绩效，领导角色，与领导行为之关系》。中华心理月刊，第23卷，第97—106页。
- 赵志裕：《从中国俗谚看中国文化的个人集体取向》，研究报告，香港大学心理系，1985年。
- 瞿海源：《问卷调查法在国内运用之检讨》，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209—228页，1982年。
- 中村元：《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中译本）》，台北：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48年。英文全译本见《NAKAMURA》（1964）。
- 费孝通：《乡土中国》，香港凤凰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
- 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
- 徐静：《从儿童故事看中国人的亲子关系》，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第201—226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70年。
-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第167—18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1984年。
- 黄光国：《四十年来台湾心理学的发展》，中国论坛十周年专辑，第120—136页。台北：《中国论坛》，1985年。
- 高尚仁：《大陆心理学研究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一九四九—一九八五）》，中国论坛十周年专辑，第137—152页。台北：《中国论坛》，1985年。
- 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的分析——初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413—428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81年。
- 李沛良：《社会科学与本土概念：以医缘为例》，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361—380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82年。
- 李亦园：《从若干仪式行为看中国国民性的一面》，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第175—200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70年。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北：正中书局重印，1963年。
-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台北：远景出版社，1963年。
- 潘菽：《〈苏联心理科学的发展与现状〉中译本前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
- 彼得罗夫斯基等：《集体的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
- 斯米尔诺夫编：《苏联心理科学的发展与现状》，第598—60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
- 文崇一：《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311—344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82年。
- 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第127—174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72年。
- 杨中芳：《香港人社会价值变迁与送礼的行为》，香港工商管理学报，第一期，第7—26页。
- 杨中芳：《欲速则不达：发展社会心理学基础研究》，初稿尚未发表，1987年。
- 杨中芳：《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简短版发表于香港各大报纸，1987年3月6日。
- 杨中芳、赵志裕：《中国被试的困境：对“等第评定量表”应用的反省》，初稿尚未发表，1986年。

- 杨中芳、许志超：《平均报酬与不公平感》，中华心理月刊，第29期，1987年7月将出版。
- 杨国枢：《三种成就动机：概念性的分析》，香港心理学会演讲，1978年。
-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及方向》，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國化》，第153—188页。南港：中央研究院，1982年。
- 杨国枢：《缘及其在现代化生活中的作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5卷，第19—42页。1982年。
- 杨国枢：《台湾民众之性格与行为变迁》，第四次科学研讨会论文集，第75—100页。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1985年。
- 杨国枢：《家庭因素与子女行为：台湾研究的评析》，香港：第二次“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1985年。
- 杨国枢：《现代社会的新孝道》，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51—67页。1986年。
- 杨国枢：《中国人之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一）多向度表之建立》（1986），尚未发表。
- 杨国枢、瞿海源：《中国人的现代化—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7卷，第1—38页。1974年。
- 杨国枢、业启政合编：《台湾的社会问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业启政：《边缘性与学术发展：再论科学中国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第247—26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1984年。
- 余安邦及杨国枢：《成就动机的类型及其测量》，尚未发表。

References

- Abbott, K.A. (1979). *Harmony and individualism: chang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Taipei and San Francisco*. Taipei, Asian Folklore and Social Life Monographs.
- Asch, S.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No. 46.
- Azuma, H. (1984). Secondary control as a heterogeneous categ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70—971.
- Berry, J.W. (1976). *Human ecology and cognitive style*.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
- Bond, M.H. (1985). Teasing etics out of emics; The case of Chinese valu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Bond, M. H. & Hwang, K. (198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 In M. H.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nd, M.H. & Lee, P.W.H. (1981). Face-saving in Chinese culture: A discuss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In A.Y.C. King & R.P.L. Lee (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pp. 288—30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iu, C. Y. & Tsang, S.C. (1984). Chinese consumer complaint behavior as correlates of face situations, attitudinal antecedents, and locus of control. Unpublished undergradu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iu, C. Y. & Yang, C.F. (1987). Chinese subjects' dilemmas: Humility and cognitive laziness as problems in using rating scales.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18 (January), 39—50.
- Chiu, L. (1972).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styl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 235—242
- Dien, D.S. (1982).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2, 331—341.
- Emler, N. (1983). Morality and politics: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H. Weinreich-Haste & D. Locke (Eds.), *Morality in the making: Thought, affect, and the social context*.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
- Geertz, C. (1973).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 (1984). "From the natur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R. A. Shweder & R. A. Levine (Eds.), *Cultural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123—1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niker, P.J. (1969). Chinese reactions to forced compliance: dissonance reduction or national characte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7, 157—176.
- Ho, D.Y.F. (1974). Face,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conflict avoidance. In J.L.M. Dawson & W.J. Lonner (Eds.), *Readings in cross-culturally psycholog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o, D.Y.F. (1976).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867—884.
- Ho, D. Y. F. (1978). Face and stereotyped notions about Chinese face behavior. In M. Akita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Planning Committee for a Pan-Asian Conference of Psychology*, Kyoto, Japan.
- Ho, D.Y.F. (1979).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llectiv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ase and Maoist dialectics. In L.H. Eckensberger, W.J. Lonner, and Y.H. Poortinga (Eds.), *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pp. 143—150. Lisse; Swets and Zeitlinger.
- Hofstede, G. (1983).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s in fifty countries and three regions. In J.B. Deregowski, S. Dziurawiec, & R.C. Annis (Eds.), *Explica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335—355. Lisse; Swets and Zeitlinger.
- Hogan, R. (1975). Theoretical egocentrism and the problem of compliance,

-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533—540.
- Hogan, R. & Emler, N. (1978). The bias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Research*, 45, 478—534.
- Hsieh, T., Shybut, J., & Lotsof (1969).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and ethnic group membership: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 122—124.
- Hsu, F.L.K. (1971a). Psychological homeostasis and jen: 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23—44.
- Hsu, F.L.K. (1971b). Eros, affect, and pao. In F.L.K.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pp. 439—476.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 Hsu, F. L. K. (1983). *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Hu, H.C. (1944).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6, 45—64.
- Hui, C.H. (1984).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Technical Report, ONR-3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Hwang, K.K. (1977). The patterns of coping strategies in a Chinese society. *Acta Psychologica Taiwanica*, 19, 61—73.
- Hwang, L.C. & Harris, H.B. (1973). Conformity in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 427—434.
- King, A. Y. C. (1981).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in Confucianis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ividualism and Wholism: The Confucian and Tao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York, Maine, June.
- King, A.Y.C. & Myers, J.T. (1977). Shame as an incomplete concept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A working paper, Social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Kohlberg, L. (1969).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A.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47—480. New York: Rand McNally.
- Kohlberg, L. (1971). From is to ought: How to commit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and get away with it in the stud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L. Mischel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epistemology*, pp. 151—2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ojima, H. (1984). A significant stride towar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trol.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72—973.
- Lao, R.C. (1978). Levenson's IPC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Scale: A

-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9, 113—124.
- Lei, T. & Cheng, S.W. (1984). A little but special light on the universality of moral judgment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Leung, K. & Bond, N.H. (1984).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ollectivism on reward allo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793—804.
- Lurie, R.A. (1976). *Cognitive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ccoby, E.E. (1983). Let not overattribute to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Comments on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ur. In E.T. Higgins, J.N. Ruble, & W.W. Hartup (Eds),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57—3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low, A.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McClelland, 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 Meade, R. D. & Barnard, W.A. (1973). Conformity and anti-conformity am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9, 15—24.
- Meade, R.D. & Barnard, W.A. (1975). Group pressure on American and Chinese femal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137—138.
- Milgram, S. (1963). Behaviou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 Miller, G.A. (1969). psychology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human welfa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4, 1063—1075.
- Nakamura, H. (1964).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China-Tibet-Japan* (English translation).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 Piaget J. (1966). Need and significanc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genetic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 3-13.
- Sahakian, W. S. (1982). History and systems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Washington: Hemisphere.
- Sampson, E.E. (1977). Psychology and the American ide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767—782.
- Sampson, E.E. (1981). Cognitive psychology as ide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730—743.
- Sampson, E.E. (1985).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dentity: Towards a revised concep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ord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203—1211.
- Schellenberg, J.A. (1978). *Mast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weder, R.A. & Bourne E.J. (1984) Does 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 Vary

- cross-culturally?. In R.A.Sheweder & R.A.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arey, J. (1985). The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of social-mor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Kohlbergian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7 202—232.
- Spence, J.J. (1985). Achievement American style: the rewards and costs of individual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285-1295.
- Spiro, M. (1951).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false dichotomy. *Psychiatry*, 36, 762—773.
- Stevenson, H.W. (1984).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A Joint Conference in Psychology*, PP. 163—176. Beijing, China.
- Stigler J.W., Lee S.Y., Lucker, G.W., & Stevenson, H. W. (1972). Curriculum and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4, 315—322.
- Waterman, A.S. (1981). Individu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to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 233—250.
- Weisz, J.R. Bothbaum, F.M., & Blackburn, T.C. (1984). standing out and stand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control in America and Jap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55—969.
- Wilson, R.W. (1974). *The moral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itkin, H.A. (1967). A cognitive-style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 233—250.
- Yang, C.F. & Kao, H. S. R. (1987). Familism and develop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famil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Hong Kong, April.
- Yang, K. S. (1981).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Furthe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 159—170.
- Yang, K.S. & Bond, M.H. (1980). Ethnic affirmation in chinese bilingual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1, 411—425.
- Yang, L.S. (1957).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In J.K.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P.291—30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eh, E.K. (1972). The Chinese mind and human freed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18 (2) , 132—137.
- Yu, E.S.H. (1972a).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McClelland's theory of achievement (下转第105页)

率”，即 $1 - \text{刑事案件发案率} = \text{刑事案件发案降低率}$ ，据此就可以计算为发展指数，还有一种情况是高限指标直接表现为总量指标，如“社会治安案件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火灾次数”等，这时可将其报告期与基期颠倒过来而计算其“倒退指数”加以表示，或根据“发展指数 \times 倒退指数 = 1”的原理，也可由其发展指数的倒数（即 $\frac{1}{\text{发展指数}}$ ）进行计算。其它有关此类指标的计算方法，均已标明在相应指标的备注栏内。

报告执笔人：张仙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吴寒光 北京财贸学院
朱一林 北京市统许局
李豫 孙彦 北京市政府研究室

责任编辑：严立贤

（上接第89页）

- vement motivation (I). *Thought and Word* (Taipei), 9, 121—125.
- Yu, E.S.H. (1972b).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McClelland's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II). *Thought and Word*(Taipei), 9, 181—188.
- Yu, E.S.H. (1980). Chinese collective orientation and need for achie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26 (3), 184—189.
- Zajonc, R.B. (1984). On the primacy of effe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117—123.

作者简介：杨中芳，美籍华人，原籍山东，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理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在美居住15年，并任教大学商学院多年。198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书，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探研。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讲师，主教社会心理学。

责任编辑：谭 深